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同化” 教育与近代“民族国家”之认同

汪 婉

内容提要 本文以 1895 年 6 月—1919 年 3 月日本占领台湾初期为背景,通过分析首任台湾总督府学务部长伊泽修二和台湾总督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教育思想和政策,对以往研究中把日据初期定义为同化教育时期的观点提出质疑。指出:总督府并非一开始就实行了“同化教育”和“皇民化教育”政策。首先,当时日本国内普遍存在着以万世一系天皇为中心的单一民族的国家观念,以“同化”手段对异民族(台湾人,朝鲜人)进行“国民统合”,与日本以同一血缘关系形成国家的单一民族观念相矛盾。其次,同化教育政策在现实中又与总督府注重经济利益的殖民经济政策相矛盾,因而遭到否定。另外“芝山巖事件”表明,台湾民众对日本的同化教育政策也进行了强烈抵抗。因此日据初期,实际上采取了日本人、台湾人和原住民三个系统的“差别教育”和“隔离教育”政策。

关键词 台湾 殖民教育 同化 皇民化

一 问题的缘起与研究现状

台湾在 1895 年到 1945 年的半个世纪中受到日本的殖民统治。日本在台湾实行了以国语^①教育为主的“同化”教育。很多

① 此处的“国语”意为日语,以下同。

研究已指出,日本的殖民教育政策与西方殖民帝国有所不同,后者殖民教育重视高等教育,以培养统治者的助手为主。从便于统治的角度,有意忽视初等教育,以使一般庶民愚昧。^①以英国统治印度为例,到1921年,英国虽在印度设有15所大学,但印度的文盲占全人口的91.8%。另一个经常被列举的例子是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从1830年到1930年的一百年中,儿童的就学率为男童11.5%,女童仅1.5%。相比之下,日本的殖民教育重视普及初等教育,日本统治台湾50年,初等教育普及率达到71.3%。日本占领台湾之后,开始对台湾人实施国语教育,明确提出要对“未开化的新附民”台湾人进行精神上的征服与同化。对于信奉“万世一系天皇之子孙”的单一民族来说,是否要把殖民地的异民族改造成“日本人”,成为当时争论的一大焦点。况且,同化政策在当时的殖民统治中并不带有普遍性,英国从未提出要通过“同化”手段将印度人改造成英国国民。在西欧殖民统治的历史中,对殖民地人民进行屠杀、隔离、奴役的情况随处可见,而试图以“同化”手段对殖民地人民进行“国民统合”的情况鲜有发生。

与西方列强不同,日本却试图在殖民统治中尝试通过“同化”教育对殖民地和殖民地人民进行“统合”。当然,日本并非自始至终毫不犹豫地实行了同化政策,姑且不论“同化”政策是否真的能把台湾人改造成日本人,首先就当时日本国内普遍存在的以万世一系天皇为中心的单一民族的国家观念而言,以“同化”手段对异民族(不仅是台湾人,还有朝鲜人等)进行“国民统合”,是和日本以同一血缘关系形成国家的单一民族观念自相矛盾的。但是,日本统治台湾的历史表明,日本由初期比较模糊的同化政策,发展为

① 矢内原忠雄著、周宪文译:《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帕米尔书店1985年版,第146页。

中期非常明确的同化主义,乃至最后的皇民化运动,从来没有放弃过“同化”的企图。这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二战后,在台湾和日本都涌现出不少关于日据下台湾殖民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1959年汪知亭的《台湾教育史》(台湾书店)是先驱性的研究。本书根据大量史料对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教育做了研究分析,其特点是史料丰富,但没有形成研究的框架和结构。这一时期的研究多为叙述沿革、概略。1980年以后,台湾教育史研究出现了飞跃性的发展。包括教育政策和制度、教育内容、各级学校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教育政策和制度方面的研究有:何义麟的《皇民化时期之学校教育》(《台湾风物》第36卷第4期,1986年),以日据台湾末期的殖民教育为主要内容,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对“皇民化运动”时期教育制度的变迁、教育课程、教育活动及教材等做了分析。李园会的《日据时期台湾师范教育制度》(国编馆,1997年),把殖民地时代师范教育制度的变化分为殖民统治初期、基础时期、确立时期、日本与台湾教育融合期、“国民学校令”颁布之后时期等五个阶段,比较分析了每个时期教育政策的不同特点。

在专题研究方面,吴文星的研究成果十分引人注目。诸如《日据时期台湾书房之研究》(《思与言杂志》1978年)、《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推广日语运动初探》(上)(《台湾风物》第37卷第1期,1987年)、同(下)(《台湾风物》第37卷第4期,1987年)、《日据时期台湾书房教育之再研究》(《思与言杂志》第26卷第1期,1988年)等。80年代初期,吴文星的《日据时期台湾师范教育之研究》(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所专刊第8期,1983年)对殖民地时代台湾师范教育的政策和制度变迁、师范学校的教学和训育、师范毕业生的职业和调动做了详细分析,以此说明师范教育对台湾社会的影响。90年代以后,吴文星的教育史研究从师范教育转为高等教育和乡土教育。《日据时期台湾的高等教育》(《史学集刊》第25期,1993

年),分析了高等教育的设置过程、发展及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并且指出:台湾的高等教育是以特殊目的设立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图谋扩张的辅助机构。吴文星的其他研究还有《日据时期台湾社会领导阶层之研究》(正中书局,1992年)等。其特点是运用大量统计数据,为日据下台湾殖民教育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来源。1993年钟清汉的《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教育史》(多贺出版)在日本出版,这是一部通史性质的台湾教育史。虽然运用了大量的史料和统计,但没有超越吴文星研究的框架和内容。

在上述主要的研究成果中,虽然没有关于“同化教育”的专题研究,但或多或少地都要涉及到“同化”问题,并具有以下特点:一方面强调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强行推行“同化”教育,另一方面强调被统治的台湾人民的反抗。随着日本同化教育愈演愈烈最终发展为皇民化教育,台湾民众的反抗也日趋激烈,最终发展为抵抗运动,直至日本战败投降。笔者虽然赞同殖民教育研究中的“压迫——反抗”模式,但同时认为,对于日本在台湾推行以初等教育为重点、以普及国语教育作为同化手段的教育政策,以及日据时期台湾的初等教育普及率达到72%这样一个事实,需要进行更为深层的分析和研究。既要分析“同化”政策产生的思想根源,追溯近代日本“国家主义国民教育”的思想;又要通过“同化”政策形成过程中各种理论和观点的对立、冲突,来阐明“同化教育”的实质。

与台湾学者较为宏观的、以教育史为范畴,又比较明显地反映出“压迫——反抗”模式的研究相比较,战后日本学者的研究,从总体上看体现了日本学界的特点,即极其精细的局部、微观研究。诸如个别人物的教育思想研究,个别教育政策研究、个别概念的研究等,以至发展为社会学领域不加批判的纯粹的概念分析。这种倾向自1990年代以后愈发严重。

1992年京极兴一的论文《国语观和殖民地语言政策》,分析了

以国语教育为中心的“同化”教育的实质。他以伊泽修二、矢内原忠雄的思想为例,指出在台湾实施国语教育的理念和具有代表性的语言政策,是以上田万年“一个国家、一个国民、一个国语”的三位一体国语观为理论基础的(《信州大学教育学部纪要》74号、75号,1991年)。上田万年把国语比喻为“日本人精神的血液”,定义为日本“国体的标识”。提出“国语、国民、民族三位一体思想”,甚至把国语作为统一日本国民共同体意识、传统精神、大和民族的基础。^①甲午战争后,上田万年又提出排斥汉字理论。^②长志珠绘在《“国语”意识形态的形成与近代天皇制国家》一文中,对甲午战争后日本出现的排斥汉字理论有详细的论述。^③

1996年,驹迤武的研究《殖民地帝国日本的文化统合》(岩波书店)使日本的台湾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驹迤将国民统合理论运用于日本的殖民统治研究,他指出:日本把台湾这一在日本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殖民地置于国家统合之“外”,并以“君民同祖”等天皇制排他的“血族国家主义”理论,使这种把殖民地人民从“日本人”中排除出去的做法正当化。从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中可以发现,统治当局利用实施国语教育这种“语言国家主义”,来掩盖国家统合中的不平等结构。他明确指出,同化是为了掩盖因帝国主

① 上田万年:《国语与国家》《明治文学全集 44》,筑摩书房 1968 年版,第 108-113 页。上田万年是明治时期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语言学教授,推动了“国家主义国语理论”的发展,被称为国语学家。

② 甲午战争后,上田万年提出排斥汉字理论:“自开辟以来,我陆海军在讨伐支那的战役中,前所未有地连战连胜。朝日之御旗(按为太阳旗)所向披靡,无人敢不从。而我国的国语界、文章界却仍处于支那影响之下,旧态依存。”上田万年《关于国语研究》,同上书,第 115 页。

③ 长志珠绘:《“国语”意识形态的形成与近代天皇制国家》,马原铁男、挂谷宰平编《近代天皇制国家的社会统合》,文理阁 1991 年版。第 121-149 页。

义而产生的民族矛盾所制造的表面上的言说。^①

中国大陆对日据下的台湾殖民教育尚无系统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学者在研究晚清教育改革及近代中国的留日热潮等课题时,开始涉及日本近代教育的内容。但由于受到资料的局限,缺乏具体的分析研究。在一些零星、片断的研究中片面强调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的文明开化政策,强调日本积极引进西方近代教育为日本的近代化带来了成功。由于缺乏实证研究,缺乏翔实的史料分析,忽视了日本“国家主义教育”的实质。笔者认为,研究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必须首先对日本近代的国家主义国民教育有一个全面了解。

而与本文主题相关,笔者将通过分析首任台湾总督府学务部长伊泽修二和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思想,以及“差别教育”和“隔离教育,对日本在台湾的初期的教育政策,同化思想产生的根源进行实证分析。

二 伊泽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与同化

在台湾教育中首先使用“同化”一词的是伊泽修二(1851-1917)。^②甲午战争后,日本“国家主义教育”的代表人物伊泽修二

① 驹逸武:《殖民地帝国日本的文化统合》,岩波书店,1996年。

② 伊泽修二 1851年出生于信浓国高远藩的贫士家庭。他作为藩的贡进生毕业于大学南校之后,就任爱知师范学校校长。明治8年被派往美国考察师范教育。明治11年回国后,对日本的音乐教育、体操教育、盲哑教育、编辑新教科书、建国语等诸多方面,做出了贡献,对奠定日本近代教育的基础起到了指导作用。伊泽同时又是国家主义的信奉者。提倡国家主义教育的第一任文部大臣森有礼于明治23年被暗杀后,伊泽作为森有礼国家主义教育理论的继承者成立了国家教育社,此后大力推进国家主义教育。

随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以首任总督府学务部长的身份来到台湾。伊泽一开始就强调教育在殖民统治中的重要性。他在国家教育社的会议上说:“我们虽然已用兵力征服了台湾,但是今后要想彻底征服台湾人的心,要使台湾千载万载永远成为日本的领土,关键在于,要对台湾人从内心深处予以同化,要做到这一点,非教育莫属。”^①他又以台湾和日本同样使用汉字,都信奉孔孟之道来说明日本对台湾实施同化远比法国同化越南容易。^②“同化”一词由美国传入日本,原本是生物学上的用语,日据台湾之后,伊泽首先用于教育领域,之后普及到其他领域。伊泽修二所说的“同化”,意在利用教育将台湾人日本化。

伊泽修二任学务部长为期两年零两个月,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最初期,日本的统治受到台湾人民的强烈抵抗,总督府忙于军事镇压和经济上的压榨,无暇顾及台湾的教育。虽然伊泽赴台前决心“要开拓新领土之教育”,但是他提出的教育经费等方案被日本政府否定。他于1895年7月在台北市近郊的士林成立“芝山巖学务部学堂”,招收台湾儿童为日语练习生。1896年5月,设立“国语传习所”。从1896年至1897年,先后在台湾各重要城市设国语传习所16所,分校18所,在台湾开创了所谓的“国语教育”。

1896年6月,总督府颁布了台湾的教育法令《国语传习所规则》(明治29年6月,府令第15号),其内容反映了伊泽修二在台湾实施国语教育的政治意图。规则第一条为:“国语传习所对本岛人实施国语教育,以有利于其日常生活,并养成本国之精神。”在

① 伊泽修二于明治1895年6月赴台,11月临时回国,11月13日在国家教育社举办的社长慰劳会上,作了题为《台湾之教育》的讲话。伊泽修二《台湾之教育》,《伊泽修二选集》,信浓教育会1958年版,第580页。

② 伊泽修二:《台湾之教育》,《伊泽修二选集》,第587页。

第十三条中又称“本所虽以传授国语为初衷,但须经常注意道德之教训、智能之启发。道德之教训旨在尊皇室、爱本国、重人伦,以养成本国之精神。智能之启发旨在获得赖以立业之知识技能”。^①由此可见,日本在台湾实施国语教育,是作为“养成本国之精神”的一种手段。反映了同化的教育方针。可以说伊泽是第一个把同化思想注入台湾教育方针的人。之后的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虽然也以“普及国语”为教育目的,但避而不谈以同化为教育方针。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忽视初期教育阶段的同化思想,片面地将初期称为“差别教育时期”。

1896年2月11日,临时回国的伊泽修二在国家教育社第六次例会的演说中再一次明确提出同化教育方针。他说:日本不应象英国对印度、法国对越南那样,将其统治的地区“仅仅作为一个殖民地,从中获取利益”。日本“必须真正地把台湾作为日本身体的一部分”。若要“真正地把台湾作为日本身体的一部分,教育便一日不可怠慢”。^②他还说:

新领土为我君之领土,欲将其人民日本化非教育莫属,为此献身亦在所不惜。构成吾辈身体之皮肤、肉、骨、血,乃吾皇祖、皇室数千年来,自吾祖辈、父辈之时起,承蒙帝室之恩泽而形成之。将此献与我君,实为荣誉之至,丝毫不足为惜。^③

在伊泽修二担任学务部长期间,日本的殖民统治受到台湾人民的强烈抵抗,1896年1月1日,以简大狮为首的义军为夺回台北城起义,将学务部成员7人中6人杀死,史称“芝山巖事件”。日

① 《系统教育的创立》,伊泽修二君还历祝贺会:《乐石自传 教界周游前记》,国书刊行会昭和55年版,第241-245页。

② 伊泽修二:《国家教育社第六次例会演说》,《伊泽修二选集》,第592-593页。

③ 同上,第595页。

本殖民统治者此后将这一事件神圣化,称之为“芝山巖精神”,视为统治台湾的教育精神之象征。伊泽以效忠天皇、为国献身的“忠君爱国”精神号召日本内地的教育者到台湾开拓新领土之教育,对“未开化的新附民”台湾人进行精神上的征服与同化。

但是,伊泽的同化思想与日本以万世一系天皇为中心的单一民族的国家观念在理论上出现对立,因此在日本受到批判。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宪法学家穗积八束提出以“血族”、“血缘”为基础的“日本民族”观念。鼓吹日本人是同祖的“血族”关系而结成的“民族”,其“民族的宗家”为“万世一系的皇室”,并将天皇的权力解释为“天皇即国家”,强调君主权的至高无上和无限制性。在穗积的宪法理论中,天皇为“族父”,皇室为“宗家”,以此团结“血族”的民族观念,是日本国家得以存立的基础。^①自穗积提出“同族日本人”理论之后,“国体论”者们争相抛出“同祖同族日本人”理论。诸如:“我日本人民为一大家族,四千万人皆同一祖先,我皇室为我四千万人之宗家。”^②“亿兆人民皆皇室之臣下,皆皇室皇族之末裔。”^③“我邦之皇统即为天孙,日本国民皆同一祖先”等。^④这种“同祖同族的日本民族”理论特别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迅速蔓延,在日本国民中形成为一种常识。

日俄战争后,“单一民族神话论”愈演愈烈。加藤弘之在《立宪的族父统治之政体》(1905年)中说:欧洲各国和日本虽同为立宪君主国,却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欧洲各国的君主仅仅是君主,而日本的天皇不仅是君主,还是日本民族的族父。欧洲无论任何国家

① 穗积八束:《国民教育爱国心》,八尾商店1897年版。

② 矶部武者五郎:《国体述义》,1892年。

③ 井上円了:《日本伦理学案》1893年。日本精神文化研究所《教育敕语关系资料》第9卷,1981年版。

④ 中西牛郎:《宗教教育冲突断案》,博文堂1893年。

在今天都不具有纯粹的单一民族,都是多个民族混合而成,或一个民族被分为数国。只有日本自建国以来,同一皇室连绵至今,且是日本民族的宗家。吾邦是建国至今日本民族的族父天皇始终保持君位的国家。因此不应称作“立宪君主统治国”,而应称为“立宪的族父统治国”。^①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天皇的绝对地位和权威来自于天皇是以血缘关系结成的单一民族的族父之地位。

日本在近代国民国家的形成过程中需要用“同祖同族的日本民族”理论,以保证天皇制国家至上而下的强权统治,以此加强所谓的“国家统合”能力和“国民统合”能力。但是这种编造出来的“单一民族神话论”也反映了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虽然在物质层面实现了所谓的近代化,在思想层面却残存着前近代的落后性和荒谬性。不仅如此,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和殖民政策中,“同祖同族的日本民族”理论与是否对殖民地进行“国家统合”和“国民统合”的理论,发生了冲突和矛盾。大西祝提出:“我怀疑穗积的君民同祖论与我国扩张的国家目标是否相容。试问:应当如何看待新领土的人民。”^②这里提出了如何对待台湾人的问题。

对此,伊泽在1899年的帝国教育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台湾公学校设置之意见》的演说。

根据古国学者们的解释,日本国民只存在于大和民族之内,不存在于大和民族之外。我认为这种解释大错特错。我皇室的恩德绝不仅限于如此狭隘的范围,实际上与天地般宏大。我皇室一视同仁地将世界各国人民视为子民,无论何人,

① 加藤弘之:《立宪的族父统治之政体》(1905年)。大久保利谦编《明治启蒙思想集》,筑摩书房1977年版,161-162页。

② 大西祝:《祖先教能否成为世教之基础》1897年。松本三之介编:《明治思想集二》筑摩书房1977年版,第145-146页。

只要服从,均可为臣民……从历史上看,我臣民之中,自天祖降临以来,一直侍奉至今者虽为多数,但也有中古以后由外国归化之人民……特别对于台湾新领土人民,必须充分贯彻皇室一视同仁之旨意。^①

伊泽试图以“只要服从”为条件来解决对异民族台湾人的同化问题。此刻,他除了把国语教育作为同化的手段和方式以外,还试图通过“教育敕语”和修身教育从精神上征服新附民,以使台湾人同化。

三 “教育敕语”与同化

1890年《教育敕语》公布之后,日本的“国家主义国民教育”体制要求全体国民效忠以天皇为核心的国体,遵循以儒教为根本的国民道德。教育成为天皇制国家实行至上而下强权统治的重要手段。日本的国民教育旨在“培养扶翼无穷皇运之忠良臣民”。这与明治维新初期“文明开化”过程中倡导的“文明之精神即体现为人民独立之意愿”的改革精神完全相反。明治国家提供给国民的义务教育机会不过是臣民必须服从于皇国的义务而已。这与西欧市民革命时期以主权在民为发展原理的国民教育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国家主义教育的信奉者伊泽既然把台湾看作是“日本身体的一部分”,自然要把《教育敕语》搬到台湾。他在《关于台湾公学校设置之意见》中指出:“台湾与本土乃同文之国,将教育敕语译成汉文,受过教育的台湾人均能读懂。”^②1899年2月18日,根据拓殖

① 伊泽修二:《关于台湾公学校设置之意见》,《伊泽修二选集》,第615-616页。

② 伊泽修二:《关于台湾公学校设置之意见》,《伊泽修二选集》,第615-616页。

务大臣第十五号训令,台湾各公私立学校必须奉读《教育敕语》的汉语译文,以切实贯彻圣旨。《教育敕语》自此成为台湾教育的最高指针。实际上,早在第十五号训令下达之前,《教育敕语》就已出现在台湾的“国语传习所”里。1898、1899年,在第一、第二次国语讲习员(芝山巖学堂生)的毕业式上,就已奉读了《教育敕语》。

《教育敕语》的汉译文内容如下: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我国体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传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熟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不独为朕之忠良臣民,亦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斯道也,实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所宜俱遵守焉。通之古今不谬,施之中外不悖。朕与尔臣民拳拳服膺,庶几咸一德!

1900年,伊泽在帝国教育会上以《关于台湾公立学校设置的意见》为题演说,强调贯彻《教育敕语》的精神是统治台湾的“首要工作”。把《教育敕语》作为教化“新附民”不可缺少的工具。试图通过《教育敕语》转移台湾人效忠的对象,强调台湾人必须对日本和天皇效忠。^①

在日本本土的学校里,在教则大纲中就明确《教育敕语》精神,并且增加修身科的课时。修身教科书的内容由《教育敕语》中的德目构成。据记载,当时日本的学校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法向学生灌输《教育敕语》的精神:第一,在各种节日和纪念日由校长奉读训示《教育敕语》;第二,每天向《教育敕语》拜礼;第三,在修身课上讲

^① 伊泽修二:《关于台湾公学校设置之意见》,《伊泽修二选集》,第615-616页。

解并注释《教育敕语》。通过上述三种方法使学生牢记日本的国体如何至高无上,贯彻实施《教育敕语》中的德目何等重要。其目的在于,一旦国家发生紧急事态,人人都须做到为天皇、为国家献身。

日本标榜在明治维新以后引进了西方的教育制度,较之当时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彻底而全面地实现了教育的近代化。但事实上,在日本的学校中有很多不同于欧美学校的仪式和活动,并按照极其周密的计划得到实施。例如向“御真影”(天皇、皇后的照片)拜礼、奉读《教育敕语》、齐唱《君之代》、以军事训练和鼓舞士气为目的举行运动会、长途跋涉、修学旅行等。明治二、三十年代赴日考察的中国人对日本学校有如下记述:

日本小学校,皆供奉君上尊影,每夜轮一教员往校敬护之。每逢佳节,事无巨细,先集生徒,排齐恭立,如见君临于前,群唱君代歌以祝。祝毕,然后敢治理他事。一切教科书,处处寓忠君爱国之意。教员不教则已,教则无不关注此意。^①

台湾的学校与日本本土学校一样,每逢纪元节、天长节、一月一日、始政纪念日,学生们都要合唱“君之代”,向天皇、皇后的照片(御真影)敬礼、奉读《教育敕语》。虽然在大正元年以后的公学校规中对此才有正式规定,但实际上这一系列仪式早在明治时期已经开始实施。

对于台湾儿童而言,理解《教育敕语》较之日本儿童更为困难。殖民教育者们试图把万世一系的天皇、忠君爱国的理念与台湾人牵强地捏合在一起,但是在教育理论上是行不通的。于是,只好通过修身课强行灌输。修身课在日本本土学校为首要课程,在台湾更是如此。1897年,台湾总督府在国语学校规则中制定了各课程的宗旨,特别在修身科中,强调忠君爱国思想。与其说修身的根本

^① 项文瑞“与东友往来问答”,《游日本学校笔记》,敬业学堂光绪二十九年版。

思想是《教育敕语》，莫如说教育的根本思想即为《教育敕语》。与本土不同的是，日本学生除了修身课以外，还学习很多实用知识，而台湾人只学习修身和日语。

四 后藤新平的“渐进主义”和“无方针主义”

伊泽竭力试图通过实施同化教育，逐渐消除台湾人与日本人的界限，达到所谓“内台一体”的共同意识。他于1897年5月在帝国教育会的演说中明确提出建立公学校的计划——6年制小学、4年制中学。但是，他的计划不仅被当时的总督乃木希典否定，而且因总督府经费膨胀问题，在日本政府内部受到政党势力的批判。两个月后，总督府学务部被缩小为学务课，伊泽被解除学务部长职务。

在伊泽之后的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治台时期(1898—1906年)，后藤新平虽然在表面上与伊泽修二一样标榜同化主义，而且对伊泽的公学校计划并不完全否认，但在教育制度和实施步骤上与伊泽有诸多不同，突出地表现为“渐进主义”和“隔离主义”。把教育作为配合内政的措施，并藉以作为统治的手段。

1898年儿玉源太郎就任台湾总督，后藤新平就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①同年7月公布台湾公学校令，8月制定公学校规则，同年10月公学校付诸实施。根据总督府的规定，公学校“以对本岛人子弟施以德育、授予实学、养成国民之性格，同时使其精通国

① 明治1895年11月，后藤新平在任卫生局长期间受芳川内相之命，向当时台湾事物局总裁伊藤博文提出《关于台湾鸦片制度之意见》，否定了当时的鸦片严禁论，主张鸦片渐禁论。后藤的这一建议受到赏识而被任命为总督府卫生顾问。1898年儿玉源太郎就任台湾总督时，后藤新平被提拔为第三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执政八年零八个月。

语为本旨”，是对8岁以上14岁以下台湾儿童实施初等教育的机关。^①但是，1898年5月25日，儿玉总督向地方长官发出的谕示中就教育指出：“向殖民地漫然输入文明是十分危险的”，因此总督府对于台湾的教育体系及政策，没有提出全盘规划或长远的既定方针。^②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对此进一步加以解释，“对新附民漫然输入文明，养成动辄议论权利义务之风，会招致不测之弊害。因此，教育方针的制定须反复加以考究。关于台湾的教育方针，眼下正在考虑之中，尚未确定”。^③

1903年，后藤新平召集约60名公学校校长开学事咨问会，就与会代表提出的教育方针的问题指出，台湾教育除了进行国(日)语教育外，并无既定方针。他说：“这个会议是以国(日)语普及为目的，只须讨论如何普及国(日)语足矣……对于智育开发，我们必须防止陷入荷兰及印度之弊害……未经深思熟虑，只因教育为善事，便贸然开设学校，乃是贻误殖民政策的做法，今后必须自负严重责任。”^④后藤常引用菲律宾等殖民地的例子，告诫在殖民地教育上过多地下功夫，只能使被统治的殖民地人民觉醒，出现反乱或独立运动。^⑤

后藤新平在表面上与伊泽修二一样标榜同化主义，但二者的思想完全不同。后藤新平原本是医生，深受生物进化史观的影响，人称“科学政治家”。他以“生物学原则”为统治台湾的思想基础。他在《国家卫生原理》(1899年)一书中，把国家比喻为人体，强调

① 文部省、教育史编纂会编：《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达史》第11页，第105-106页。

② 鹤见佑辅编著：《后藤新平》第2卷，后藤新平伯传记编撰会，昭和12年，第42页。
(非卖品)

③ 《后藤长官训示》，《台湾教育会杂志》27号，明治37年6月，第3页。

④ 后藤新平《日本殖民政策之一斑》，第110-111页。

⑤ 鹤见佑辅编著：《后藤新平》第2卷，第42页。

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原理。他的理论是英国学者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进化论、德国学者斯坦恩(Lorenz von Stein)的国家思想、卫生思想,以及他自身作为医生的经历、生物学知识等的混杂物。他认为台湾人和日本人处于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在进化过程中不可能出现突然的改变,因而否认人为的同化。他以“文明”的优劣作为能否同化的标准,把日本人和台湾人的不同解释为文明上的优秀和劣等、进步和未开化。伊泽修二曾在《台湾之教育》中说:“在重视教育方面,台湾与本国相差无几,一般町村都有秀才教育儿童,大的市街都有两、三所类似小学等设施。有钱人更加注重子女之教育。但是,台湾人接受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旧教育、汉学教育。”^①按照伊泽的推论,台湾人和日本人在教育上的差距不过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三十几年而已。但是,后藤把日本和台湾比喻为“加吉鱼的眼睛和扁口鱼的眼睛”。他说:“加吉鱼的眼睛端正地长在头的两侧,而扁口鱼的眼睛都长在头的一侧。尽管非常可笑,却不可能用加吉鱼的眼睛去替代它,这是生物学上的需要,政治也是如此。”^②后藤以此证明,对未开化的台湾实施文明日本的文化教育制度,是不懂政治的荒谬行为。后藤认为台湾的文明度相当之低,他这样描述“藩界的生活状态”:^③“我仿佛感到一夜之间历史倒退了三千年,我看到的是居住在乐园的太古人类。古典和神话传说中的情形真实地出现在眼前。”^④后藤也否认台湾人对教育的认识和热心:“有人说本岛人(台湾人——笔者注)喜好读书,在我看来绝非如此。只不

① 伊泽修二《台湾之教育》《伊泽修二选集》第584—585页。

② 鹤见佑辅编著:《后藤新平》第2卷,第398—399页。

③ 后藤新平:《关于赤十字社事业》明治38年4月25日。《后藤新平文书》R24—28—5。

过在红白喜事时读书人总被请在上座,只因读书人受人尊重,所以人们才去读书”。^①后藤以台湾人民文明程度低为理由,反对把日本内地的统治方式运用于台湾,他把这种方式讥讽为“诗人的统治”方式。

伊泽认为通过国语教育可以逐渐使台湾人日本化,最终达到同化之目的。对此后藤始终持怀疑态度。他坚持认为台湾人“归根到底是不可同化的支那人种”的末裔。伊泽为加速台湾人的同化,要求台湾各公私立学校必须奉读《教育敕语》的汉语译文,把《教育敕语》视为教化“新附民”不可缺少的工具,试图以此转移台湾人效忠的对象。后藤认为,“台湾人不具备日本人那种超人崇拜的先天传习”,因此,要求台湾人奉读《教育敕语》以养成“忠君爱国的日本精神”,其结果不过是“读论语而不知论语为何物”而已。^②

1898年3月后藤到任后,立刻开始了大幅度的“革新”,以维持台湾的“治安”为由,对台湾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后藤自己也承认,在他担任总督府民政长官期间将大批台湾人关进监狱或杀戮。从1897至1901年,他抓获“土匪”8030人,杀戮3473人以上。在1902年的大讨伐中,对抓获的俘虏经审判处以死刑539名,当场杀戮4043名。^③后藤赴台后的所谓“施政改革”,以“钢腕”著称。

五 “差别教育”、“隔离教育”

后藤既否认通过国语教育可使台湾人日本化,又否认通过奉

① 《后藤长官训示》、《台湾教育会杂志》27号,明治1904年6月,第6页。

② 《后藤长官训示》、《台湾教育会杂志》27号,明治1904年6月,第3页。

③ 鹤见佑辅编著:《后藤新平》,第2卷,第149页。

读《教育敕语》、灌输忠君爱国思想可以教化台湾人,因此当然不会赞同把更多的预算用于台湾人的教育。他说“如德国对波兰实施强制性国语之普及,没有任何好处”。^① 鉴于欧美各国在殖民地实施同化主义的失败教训,后藤对伊泽的同化教育政策持批判态度。对于从“国家统合”的角度,通过在殖民地普及义务教育造就“国民”的观点持否定态度。

根据伊泽的同化思想而制定的“学务部创设后事业之概略”,计划在 1898 年至 1901 年间,按照台湾全岛 524377 户、2629115 人口、125821 名学龄儿童来计算,以 120 名儿童建立一所学校的标准,在台湾全岛将设立 254 个公学校。^② 也就是说,在 1901 年要使学龄儿童的 1/4 就学于公学校。但是,后藤执政以后,这个计划完全被搁置。

公学校的“公”,是相对于“官立”的“公立”,后藤把伊泽时期的官立国语传习所改变为公立的公学校。具体就经费而言,教育费由原来的国库负担转为地方财政负担。除了日本教员的工资由日本国库负担以外,维持公学校的其他一切费用均依赖学生支付的学费、地方税及当地居民的募捐。由地方街庄自行申请,地方官认为当地能够承受上述负担的地方,才允许其建立学校。因此,除了一部分富裕的乡绅层外,公学校在台湾民众中不受欢迎。

直至 1919 年台湾教育令颁布为止,台湾人公学校的扩充十分缓慢,入学率一直很低,1915 年时尚不足 10%,能完成公学校教育者为数甚少。1926 年,学龄儿童的升学率如下:

日本人:男子 98.3%,女子 98.1%,平均 98.2%。

台湾人:男子 43.0%,女子 12.3%,平均 28.4%。

① 后藤新平:《最近殖民政策》,第 4 页,《后藤新平文书》。

② 《学务部创设后事业之概略》,1898 年,《后藤新平文书》R32-87-1。

高山族:男子 74.3%,女子 69.4%,平均 71.8%。^①

由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台湾人的初等教育普及率非常之低,甚至不及高山族一半。总督府对于原住民是用政府经费设立公学校,并以官宪奖励其就学。

综上所述,从形式上看,这个时期实行的是差别教育,也有学者称之为隔离教育。分为日本人、台湾人和原住民三个系统的差别待遇教育。对于在台湾的日本人子弟,总督府根据日本国内的小学校令及中学校令,另设小学校和中学校,实施与日本国内相同的教育,以便其回国后接受高等教育。对台湾人则设立六年制公学校,台湾儿童在“公学校”毕业后,升入专为台湾子弟所设隔离职业学校。对于原住民则另设蕃人公学校,并于 1914 年另颁《蕃人公学校规则》,修业年限仅 4 年,较一般公学校短两年,连课程、教科书等也与一般公学校不同。另外,这一时期,台湾传统的“书房”在总督府有计划的取缔之下,逐渐趋于末落。

从教育内容和水平来看,后藤反对拓宽或加深台湾人受教育的范围和程度,反对扩充公学校的教材内容。他就公学校的教科书编撰问题指出:“直到明治十五、六年为止,日本内地的教育尚不如现在的公学校完备,此乃时势使然。若与当时的情况相比,现在的公学校不应有过分的要求。”^② 在后藤看来,在台湾实施教育不过是日本在殖民地经营上获取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而已,因此,台湾教育维持以实业教育为主的低水平足矣。在这一时期,台湾总督府和日本国内政府对台湾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都采取了抑制的政策。

官方对公学校没有任何经费上的资助,却制定了教科书审定

① 矢内原忠雄著 周宪文译:《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第 145 页。

② 《后藤长官训示》,《台湾教育会杂志》27 号,1904 年 6 月,第 5 页。

制度,干预和控制其教学内容。就课程而言,日本儿童就读的“小学校”课程与日本国内相同,而台湾儿童的“公学校”课程是经过殖民统治当局刻意改编的。在公学校的课程中,日语作为同化政策的重要工具,占有重要地位。“修身”课程的主要目的在于把台湾儿童塑造成为忠顺的日本国民。日本人的“小学校”课程和台湾人的公学校课程除了在程度上有很大差别以外,在内容上也有很大不同。在小学校的日语读本和修身教本中,对于日本名人事迹的介绍,大都宣扬其奋发向上,最终出人头地,成为社会各阶层领导人物的奋斗过程。而在台湾人公学校的日语和修身教本中,对于同一名人事迹的叙述,则偏重于其人诚实、忠顺,最终得到上级的赏识和提拔,或强调其人在实业方面的贡献,绝不提及成为政治上的领导者。在日本人小学校的课程中,日本儿童被教育成为能够积极争取权利和机会,创造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而在公学校中,主要教育台湾儿童继承父兄之职业,赚钱养活家人,对家庭尽责,与家人和睦相处,如此而已。^①

由于儒教传统已成为一种民间信仰扎根于台湾民众之中,在国语传习所的汉文科和公学校的读书科中,不得不保留了“四书五经”。但是,总督府从一开始就对教科书进行了严格的审定。伊泽修二曾说:“对于教科书须特别加以注意,虽然不能完全排斥汉文和孔孟主义,但也不能全部采用。否则岂不成了支那的教育,又如何体现日本帝国之教育呢?”^②例如,首先删除了《三字经》中关于清朝的记述,指定以《增订三字经》(1896年)作为课本。在公学校

① 参见欧用生:《日据时代台湾公学校课程之研究》,《台湾省立台南师专学报》第12期。

② 《台湾的初等教育》,伊泽修二君还历祝贺会:《乐石自传 教界周游前记》,国书刊行会1980年版,第252-253页。

的课本中删除孟子。因孟子“虽万世一系之天子,行王道者皆可为王”的思想被认为与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背道而驰。近世以来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一直被日本的儒教视为异端,特别是周武王因暴虐的殷纣王失去“天命”,即民众的支持而将其放逐,被认为是危险的思想。这种肯定“易姓革命”的思想与日本的国体论是相对立的。国体论强调王统的延续性,以使“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在理论上得以正当化。

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公学校的教育目的在表面上是要同化台湾人,但实质上并不想使台湾人成为日本人,而要使台湾儿童成为服从、勤勉的臣民。并非在使台湾社会彻底日本化,而只是以公学校教育作为同化政策的手段而已。

六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日据台湾初期,是其殖民教育政策的摸索时期。近代日本标榜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国家主义国民教育”是其推动近代化的重要凭借。日据下的台湾殖民教育,同样以教育作为国家主义目标的有效工具。伊泽修二在“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指导下,除了对台湾人实施国语教育以谋同化外,还要求台湾各公私立学校和日本内地学校一样,奉读教育敕语的汉译文,试图通过教育敕语转移台湾人的效忠对象,强调台湾人对日本和天皇的效忠。但是,“芝山巖事件”表明,这种同化教育受到台湾人民的强烈抵抗。不仅如此,伊泽的同化教育政策在日本国内也遭到批判。其政策在理论上与日本国内以万世一系天皇为中心的单一民族的国家观念相冲突;在现实中又与总督府注重经济利益的殖民政策相矛盾。因此,伊泽的同化教育政策并未得到顺利实施。

此后,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以其荒谬的生物进化史观,污蔑台湾人与日本人处于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把日本人和台湾人的不同解释为文明上的优秀和劣等、进步和未开化。以所谓“文明”的优劣作为能否同化的标准,认为在台湾实施日本的文化教育制度,是不懂政治的荒谬行为,从而否定人为的同化政策。后藤时期主要采取了“渐进主义”和“隔离主义”方针,在政治上对台湾人进行残酷镇压,反映在教育上是“差别教育”和“隔离教育”。

由此可见,日据台湾初期,并非一开始就实行了彻底的“同化”政策,更不是“皇民化”政策。特别是占领初期,总督府采取了随机应变的“无方针主义”政策,继而采取渐进主义原则。在这一过程中,时而倾向于同化,时而否定同化。尽管如此,总督府当局一开始就制定了“国语教育”政策,明确了以初等教育为重点、以日语教育为中心对台湾人进行同化的政策,而且这一基本方针在日据台湾50年中始终没有改变。可以说,初期所确定的“国语教育”政策,奠定了后来同化教育、皇民化教育的基础。

(作者汪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 兵)